

# 填报高考志愿需要四个“多一分”

杨程



近期,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填报志愿将成为广大考生和家长面临的又一次“大考”。如何选择地域、学校、专业,都是摆在考生和家长面前的必答题,每个家庭都希望考生在既定考分的前提下做出最优决策,选择最为理想的高校和专业。那么,如何更好地填报高考志愿,笔者认为需要做到四个“多一分”。

填报高考志愿需要多一分理性。据教育部最新公布的数据,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005所,其中普

通高等学校2740所。高考成绩公布后,虽然每个考生可以大致定位高校范围,但究竟是选择竞争相对激烈的北上广深等大城市,还是选择竞争压力相对较小的中小城市,究竟是选择医学、计算机科学、金融学等热门专业,还是选择物理学、化学、哲学等基础性专业,对于不少考生而言仍然较难做出决断。笔者建议,家长应当做好参谋工作,结合家庭的经济条件、社会阅历引导考生正确认识自己、正视现实,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要将个人兴趣爱好、职业发展规划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起来,理性选择高校和专业,不可盲目,亦不可盲从。

填报高考志愿需要多一分专业。广大家长和考生之所以如此重视填报志愿,是因为志愿填报

是有技巧的,稍有疏忽就有可能与心仪的高校失之交臂,因此要提高志愿填报的专业性。一方面,要做到“知分、知线、知位”,即考生要知道自己的分数、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及考生高考总分在全省同科类考生排位中的位置,而后参照往年高校录取的相关数据,就能确定一份范围相对较小的高校名单。另一方面,要及时收集目标高校的相关资料,如近三年目标高校在本省录取分数、录取考生的位次情况及当年的招生专业等信息,特别是要用好用目标高校《招生章程》这个依据,其中涵盖了学校层次、专业设置、招生计划等重要信息,是考生填报志愿的重要参考资料。

填报高考志愿需要多一分谨慎。每年在高考志愿填报过程中,

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考生和家长不熟悉高考相关招生政策实施诈骗,有的宣称有高校“内部指标”,只要花钱就能搞定,有的通过虚假分数查询链接植入木马程序,非法拦截窃取银行卡等信息获取利益。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保护好准考证、考生号和密码等重要信息,不要轻易泄露或晒到网上,特别是志愿填报信息不能外泄,以防发生高考志愿被他人恶意篡改的情况,坚决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理睬、不转账,确保信息、资金和人身安全。

填报高考志愿需要多一分豁达。高考成绩公布后,必定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今年的高考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极为特殊,很多考生不得不承受考试、疫情和自然灾害等多重因素带来的压力,在填报

志愿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心理焦虑,需要家长持续关注考生的心理状态,避免因志愿填报意见不合产生矛盾,引导考生成绩不理想的考生积极面对,及时走出低谷,避免极端事件的发生。事实上,我们要清楚,填报高考志愿并不是对考生一生的定格,而只是人生中的一个节点。人是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随着考生不断深入地了解社会、了解自己,可能会发现当前所选的高校、专业并不是自己最喜欢的,今后读硕士、博士仍可以重新选择。因此,家长和考生都要多一分豁达,少一分烦恼。可见,填报高考志愿需要考生与家长共同答卷,做到理性、专业、谨慎和豁达才能事半功倍。

(作者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副研究员)

## 师德是为师者的职业基石

邱磊

据媒体报道,山西朔州一小学老师,因不满学生只给班主任送花,自己“未受尊重”,而在毕业典礼上当众向学生吐口水、踢凳子、砸鲜花,并多次辱骂学生。事件曝光后,当地教育局于日前通报称,在调查组核实情况后,依法依规按程序给予其留党察看两年、撤销教师资格、降低岗位等级、调离教育系统等等处理,同时给予部分负有领导责任的局、校管理者以不同程度的处分。

从媒体还原的事实真相看,学生及家长并无失当之处。事发当日,家长出于好意,自行购买一束鲜花,并由孩子放在讲台上,以示对全体老师的感恩之情。班主任见到后,本能地表示感谢。事情至此,均正常不过;但这融冷感情、温馨和美之举,却被当事人误解为一种区别对待,自己似乎备受冷落和忽视,情绪失控,导致后续严重的失态言论及过火举动。

每到毕业季,为纪念数年寒窗苦读及师生、同侪之谊,各地各校均会举办一定的活动。送花留念等行为,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了。然而这一次,其他家长、孩子不送鲜花倒是相安无事,反倒是特地用心者遭受了无端指责和戳心谩骂。可见,这是件多么令用心者、真情者感到寒心、伤心的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懂事的学生在事发时,察觉苗头不对,曾给家长打电话商量再补鲜花,却被当事人抢过电话,继续辱骂。难怪事发后,影响不佳,群情激愤,对当地教育和教师形象产生了一定影响。

为什么仅仅因一束花,而触动了敏感神经,导致了难以收场的尴尬与遗憾?从报道看,这与当事人的师德缺失有关。师德、师艺、师爱,为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所必备,其中的师德又是这一切的基础。以教育目标论,“立德树人”成为众所周知的根本,试问教师自己师德存在缺失,如何能够胜任教师这一工作?

对教师来说,教育行业的特殊性要求他们不仅是一个技术型、实务型的普通劳动者,而且对受教育者的精神世界、人格健全、价值导向等,起到春风化雨的“濡染”作用。教育事业的“滞后性”,也表现为对受教育者的影响,会在人生发展的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结果,这不是学校的现行评价所能定终身的。一言以蔽之,教育的复杂性、发展性,令“育人”的要求远大于“育才”“育知”,从这个意义上说,师艺不高尚可慢慢修炼,但师德有缺,则不能从事这一职业,否则只是在毁人不倦。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管理,也存在着一一定的失察之处。树立一地、一班、一班的形象,其过程虽不说筚路蓝缕,却也是要付出极大努力的,但选人不察、用人不善,却可以在顷刻间对教育工作造成较大损害。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而发展教育、选拔人才,又以师德为先。由一束鲜花引出的这场师生风波让人看到,包括当事人在内的教育工作者、管理者,失去的并不是孩子与家长的关爱与尊重,而是一颗对职业充分理解、敬重与善待的心。广大教育工作者有必要警钟长鸣,牢记师德红线是为师者的道德底线,更是教育立场与育人价值的价值底线。(作者系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教师)

## 花钱上好学校? 骗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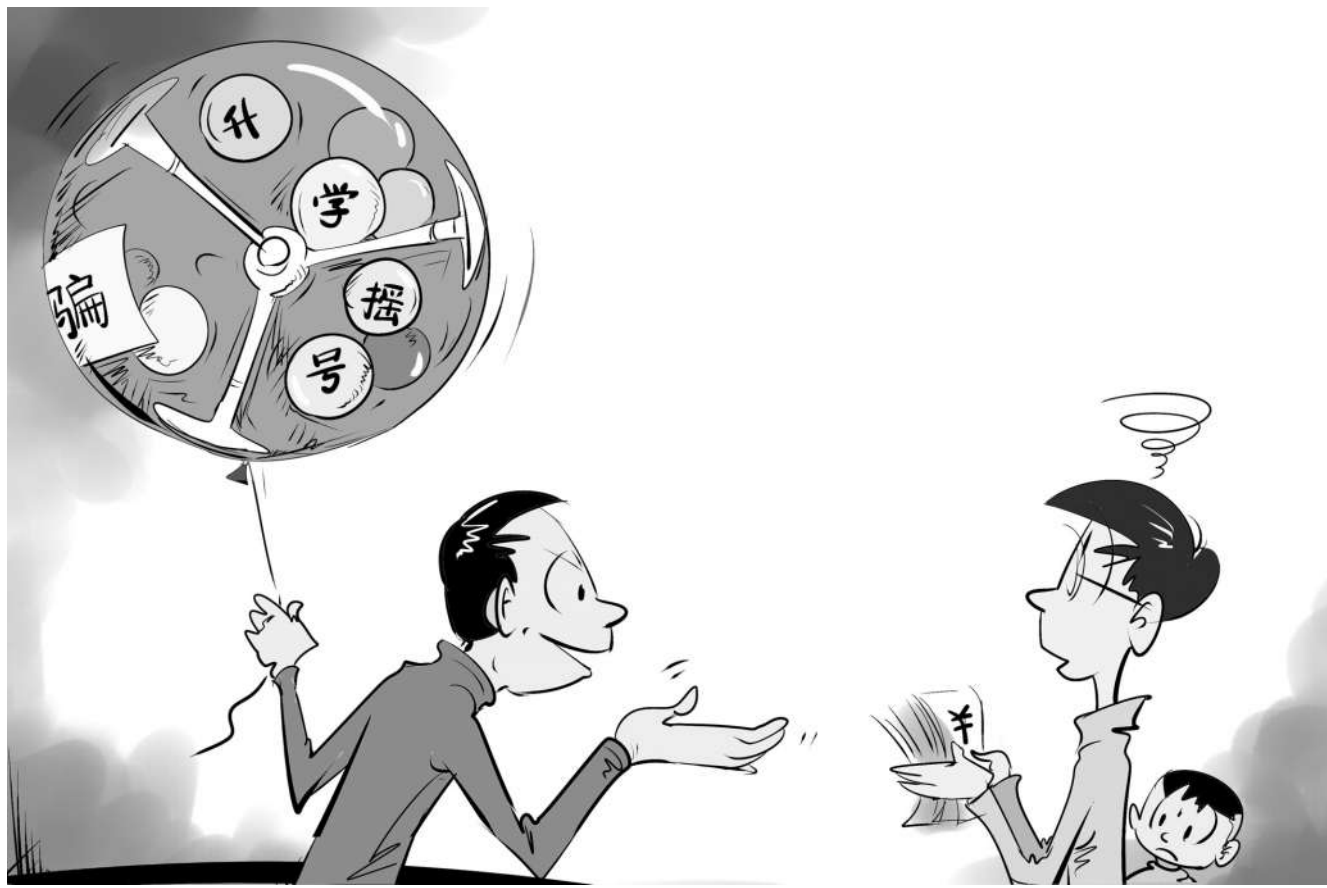
### 花钱上好学校? 骗局!

为了让孩子有个好的小学可上,西安的孟先生托朋友的朋友给孩子办理“幼升小”。说好的10万元,前期给了9万,但后来孟先生自己准备材料又是线下审核又是网上报名的,没想到孩子被摇中了,“朋友”却说这是花钱操作的结果。孟先生觉得自己是被人骗了。

西安警方相关负责人告诉《华商报》记者,已着手安排管辖地雁塔分局相关派出所,向孟先生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并随即找到办事人廖某。据公安雁塔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经过调查,最终廖某承认,拿到孟先生给的9万元后,有5万多元还了信用卡欠款,还有一部分用于生活开支,目前剩3万元在家中存放。“可以确认此事跟学校没有关系,是廖某一手导演的一场骗局。”

有教育界人士提醒家长,现在社会上不少人利用部分家长想把孩子送进名校的急迫心理,声称“花钱”就能上名校,骗取家长钱财。广大家长切勿听信此类谎言,避免上当受骗,花了冤枉钱不说,还可能耽误了孩子。

石向阳 绘



(上接第一版)

相对于集体备课、师徒制等传统的教师成长路径,名师工作室新在何处?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研究中心主任鱼霞认为,集体备课是共同解决在教育教学中遇到的问题,人员不固定,形式较为松散,而师徒制局限于“一对一”的学习方式,不易做到海纳百川,局限了学统的专业发展。

“名师工作室代表了教师专业学习范式的转变,更利于激发教师成长的内生动力。”鱼霞进一步解释,工作室的主持人通常是在某一区域内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具备独特的教育教学主张或者风格,有学科的话语权和示范作用,这样的人去引领建设学习共同体,同伴共生互助,志同道合,互有共鸣,克服了学习的孤独感,这种氛围对于激发教师的自生动力极为有利。

名师工作室是一个社群概念,让教师专业成长从“我”变成“我们”,其价值取向,是通过建构一种培养机制,改变名师成长与产生的自然状态,“规模培养”名师,“可以预判,名师工作室作为一种专业学习共同体,将成为我国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新模式和提升骨干教师课程领导力的新途径。”胡继飞说。

### 遍地开花的名师工作室

2005年,上海市教委启动了第一期“上海市普教系统名校长名教师培养工程”,至今已走过10余个年头,进入第四期培养阶段。

广东省名师工作室始建于2009年,当时称为“广东省教师工作室”。2018年启动新一轮的工作室建设,改名为“广东省名师工作室”。如今,广东省省级层面共有308个名师工作室。

2011年,北京市启动了“名师发展工程”,如今已经发展到第七批。

2013年,山西省启动了“山西省中小学名师培养计划”,选拔了150名教师,经过培训研修,于2018年对首批124名培养对象评定,授予“山西省中小学教师名师”,依托这批名师,要求建立名师工作室。

2015年起,湖北省将评选“湖北名师”升级为评选“湖北名师工作室”。推动教师评价从“评

价个人”向“搭建平台”转变,首批中小学“湖北名师工作室”22个。

2017年5月,河北省教育厅发布了《关于启动名师工作室研修项目的通知》。

2018年7月,江苏省开始推进省一级名师工作室建设,谓之领航名师培养工程。

……

根据官方公开资料,记者对31个省份的名师工作室进行了调研梳理,除了少数省份没有在全省层面推进名师工作室(但不代表市县级名师工作室不活跃),其他省份的名师工作室可谓遍地开花,而且时间相对集中于2010年之后。这是个有意思的现象,为什么是这个时间?

我们把目光投向2010年前后我国的基础教育。2011年,我国全面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两基”如星星之火,串联起了基础教育的重要转折。教育督导制度发轫于“两基”,免费义务教育实现于“两基”,均衡发展起步于“两基”,素质教育理念脱胎于“两基”……当数量不再是基础教育面临的重大问题,质量提升的呼声渐高,这其中,质量提升的最核心要素是教师。

“虽然名师工作室在20年里一直在发展,但是近10年来发展势头更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教育研究所教授桑园元分析认为,2001年,国家义务教育新课程改革在全国铺开,所以在江浙一带、东南沿海一带开始大力推广名师工作室,这是基于对新课改背景下优质教师资源的迫切需求。近10年来,义务教育课程改革进入深水期,高中课程改革也刚好是这10年,加上高考改革,反过来影响到义务教育阶段,对教师的专业化成长给予期待,导致了名师工作室的涌现。

记者调研发现,全国各地名师工作室的发展既存在共性,也差异颇大。从组织结构来看,名师工作室分为教育行政部门亲力亲为、依托教师培养基地、教师自发组织等不同类型,并以前两者居多。授牌的主体也有差异,有省级名师工作室,也有市县级名师工作室。有的

## “名师孵化器”在行动

工作室以项目驱动的形式开展;有的是根据本区域教育发展目标来带领区域内骨干教师发展;有的采用流动工作站方式,有严格的进出站要求。

从经费上来看,差异更大。最高的是江苏领航名师培养工程,每年经费不低于18万元;最低为河北省,每年1万元。每年3万至10万元的最为常见,比如,上海第四期“双名工程”中,分高峰工作室和攻关基地两个标准拨付经费,高峰工作室3年下拨款资金20万元,攻关基地3年经费10万元。

从培养周期来看,时间为一年到三年不等,一年的大多以项目带动;从成员组成来说,大部分由官方机构遴选,广西、陕西等部分省份的名师工作室成员由主持人自主选择、提名。大多数省份对于学员的区域均衡都有要求,比如,江苏省名师工作室,要求本市成员比例不能超过70%,一个省级名师工作室30名成员,需兼顾全省13个大市。

即便是一位名师,但并不代表有能力引领好一个专业组织的发展。所以,先培养名师,再进行名师工作室建设,也成为河南、山西、江西、陕西等省份的选择。

另外,调研发现,鉴于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各省份普遍都有网络平台建设的需求,从江西、湖南等省的政策文件来看,都重视建设网络名师工作室;河北、浙江、广东的名师工作室网络平台内容较丰富。

### 踩着“痛点”跳舞

2019年11月28日,贵州教师张秋荷有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她将自己研究的“乡土语文”理念推向全国,年仅27岁的她已是全省最年轻的乡村名师。

而在2017年,这位年轻的特岗教师还是贵州省张梅乡村名师工作室的一名成员。短短两年,她成长迅速,捧回了全国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省级一等奖、全国三等奖奖杯。

张秋荷成长的平台有点特别——乡村名师工作室,这也是贵州省的独创。贵州乡村名师工作室管理办负

责人、贵州教师教育学校校长张佩玲介绍,贵州在名师工作室的基础上,并行乡村名师工作室,基于一种考虑:贵州省65%以上是乡村教师。乡村队伍庞大,但整体质量和整体教育水平偏低。要想提高贵州省基础教育质量,提升乡村教师水平是重中之重,所以要夯实底部,进而推高顶部——乡村教师的顶部。

为此,贵州省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服务机构——乡村名师工作室管理办公室。按照规划,从2015年起,用5年时间建设1500个名师工作室,目前已建成1086个,覆盖了贵州一半的乡镇。

“最开始建队伍时,所有工作室只有两名特级教师,现在已经有20多名乡村教师主持人评为特级教师,还有十几名评为正高级,近30名教师获得省级优秀教师、优秀教育管理者的称号。有的学员培养第二年即成为主持人,说明工作室真的起到了孵化名师、引领成长的作用。”张佩玲说。

张佩玲观察到,乡村教师更多关注怎么做的实操内容,对于“为什么”的需求不明显,但成为名师一定要知道“为什么”。为此,贵州设立乡村教师专项课题,避免乡村教师的课题被竞争排挤掉。“经过一两年的引导,主持人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了,但遗憾的是,相对于1000多个工作室,能立项的课题数量还是太少。”

记者采访中发现,名师工作室作为名师的“加油站”和“孵化器”,作为名师的后备梯队,慢慢成为区域解决教师队伍“痛点”的抓手。“痛点”不一样,做法就千差万别,名师工作室被寄予带动、聚焦区域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厚望。

对于东部,面临的情形又不一样。据上海市教委有关负责人称,2005年,上海市教委启动了第一期“上海市普教系统名校长名教师培养工程”。“双名工程”的缘起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本世纪初,社会的发展提出了培养高素质、多样化、创新型人才的目标,相应地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二是彼时上海基础教育正面临着师资队伍“青黄不接”的局面,一批知名校长、知名教师退

休,新的领军型校长和教师后继乏人。三是当时社会上“教育家在哪里”之问,“教育家办教育”成为新的教育战略。在此背景下上海“双名工程”应运而生。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经过10年的发展,前3期“双名工程”共培育“双名基地”主持人212人、学员近3000位,第四期开始“聚焦难点,攻克难点”,聚焦解决基础教育实践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聚焦学科德育与全员全程育人的关键问题,针对不同梯队的培养对象,设置三大培养计划:“高峰计划”“攻关计划”和“种子计划”,值得一提的是,“高峰计划”旨在培养具有厚实专业素养、先进教育理念的教育家型校长和教师。

“原来的模式是一个团队,但是‘高峰计划’是要持续地打造一个人。上海已经有一些很高端的教育人才,但是要成为一名教育家,势必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代表性的教育思想,需要借助专业的力量和平台来梳理总结、辐射影响已有的成果。”这位负责人解释说。

从全国范围来看,大多数名师工作室已经成为别的组织、别的机构不可替代的教师专业发展的平台或途径,不仅培养了大量优质的教师资源,还为区域发展带来品牌效应。比如,江苏南通,前几年成立了以李吉林等教育家领衔的高端名师工作室,这几年活跃着王笑梅等年轻一辈的名师工作室,引领着区域教育向前发展。在江苏省知名品牌评选中,“南通教育”是唯一一个以教育名义入围的知名品牌。

名师工作室作为新生事物,在实际运行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少。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于伟认为,有关“名师”的问题仍是名师工作室的最大阻力,有些名师已经远离教学一线,有的挂牌收徒,但是很少组织教研活动,工作室形同虚设,也有的名师教学经验非常丰富,呈现鲜明的个性,却无法形成辐射力。

“另外,名师工作室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机制性障碍。”于伟分析认为,名师工作室呈现“非官非民”的定位和尴尬处境,表现为工作室目标不明、教育行政部门收放力度不够、领衔人职权比重不尽合理等。

如何让名师工作室成长为有生命力的共同体,让这支教师专业成长的“特种部队”展开拳脚,孵化更多的名师,成为优化教育生态和区域环境的示范性力量,显然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

## 夏令营活动须因“疫”制宜

张国栋

目前,大中小学陆续进入暑假,随着北京疫情防控形势趋稳向好,部分京内外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拟组织面向学生的夏令营、研学旅行等活动。对此,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通知,明确暑假期间,北京教育系统不组织、不接待各类夏令营等聚集性活动。高等学校继续实施校园封闭式管理,校外人员一律不得进入校园,严防聚集性、输入性风险,确保校园安全。

显然,这一通知不仅来得及时而且必要。暑假是组织开展各类夏令营、研学旅行等活动的“黄金时期”,虽然这有利于学生们开阔视野、增长知识、陶冶情操,然而因为疫情,今年的暑假注定不同往昔,一旦开展此类活动,就免不了要聚集、扎堆,存在疫情传播风险。因此权衡利弊,北京市有关部门进一步明确,暑假期间,不组织、不接待各类夏令营等聚集性活动,以防患于未然,是明智之举。

有人认为,各地疫情防控形势不同、风险等级不同,各类夏令营等聚集性活动无须都像北京市那样统统取消,这话不无道理。但在我看来,即便如此,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各地要组织开展各类夏令营、研学旅行等活动,也决不能像往常那样“说走就走”,无所顾忌。而是必须因“疫”制宜,无论参与人员数量、去往场所还是活动内容、停留时间等,都要科学研判,周密部署,合理安排,全方位做好疫情防控,确保安全。

事实上,组织学生开展一些夏令营、研学旅行等聚集性活动,虽有其合理性甚至必要性,已成为一种传统或习惯,但也不是暑假期间唯一的正确选项,也谈不上是“刚需”。除此之外,其实还有许多选项,比如学校可以指导家庭为学生安排合理的居家劳动,学习必要的生活技能,培养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和方式。也可以借助“互联网+”技术,推出和鼓励中小学生在积极参与上级和当地教育部门组织的网上夏令营活动等。

总之,疫情还未结束,各类夏令营、研学旅行等聚集性活动还是暂时予以“关停”,实行“不组织、不接待”为好。即使有些地区风险较小,可以组织开展此类活动,也必须因“疫”制宜,统筹兼顾,全面而严格地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千万不能让狡猾的病毒借着暑假及其夏令营、研学旅行等各类聚集性活动,再次侵入人体,传播开来。这是起码的底线要求,可谓责任重于泰山,谁都不可以心存侥幸、麻痹大意。(作者系职员)